

中国政法大學 教育文選

(第14輯)

曹義孫◎主編

李慧敏◎副主編

邁克爾·W·阿普爾 || 全球化大學中的管理主義、勞動與新興運動

譚曉玉 || 學位立法與學位政策的國際比較與借鑒

楊克瑞 || 大學評議會與教授治校

瑪莎·米諾 || 為21世紀培養國際性法律人才

陳景善 芦 超 || 早稻田大學商法教學模式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 教育文选

(第14辑)

曹义孙◎主编 李慧敏◎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选. 第14辑 / 曹义孙主编.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5620-5007-0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高等学校—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G64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1217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编委会



顾问：石亚军 谢维和 劳凯声

主任：黄 进

副主任：张保生

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 拓 曹义孙 常保国 李曙光

马陆亭 秦惠民 单 纯 孙选中

王 平 应 星 俞学明 于志刚

编辑部



主 编：曹义孙

副主编：李慧敏

编 辑：胡晓进 刘坤轮 尹 超 王超奕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100088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与评估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选》编辑部

电话：010-58908079

邮箱：58908079@163.com

高教政策与管理



Gao Jiao Zheng Ce Yu Guan Li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高教政策与管理

全球化大学中的管理主义、劳动与新兴运动 / 迈克尔·W. 阿普尔 著

李慧敏 译 2

高等教育管理的学科范式：从“实践研究”到“自我研究” / 张传萍 12

高教法治

学位立法与学位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谭晓玉 22

非营利性民办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 / 秦和 张维平 53

大学评议会与教授治校 / 杨克瑞 85

我国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宪法权利实现路径探析 / 郝淑华 94

研究生导师权利研究 / 马焕灵 102

大学章程的制定与执行研究 / 袁春艳 张东 114

学生视角中的大学章程建设 / 王绽蕊 郭林彬 杨蕤 124

高教实践与评估

北京高校多元化科普活动测评的实践研究 / 王晶莹 张跃 张志敏 134

大学新生教育：断裂、适应与跨越 / 李庆丰 廖满媛 黄晓红 144

2012 年中国政法大学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工作实践探索 / 曾涛 178

教育财政

基于政策工具选择视角下的民办高校经费筹措风险规避

策略研究 / 李世奇 190

教育模式

为 21 世纪培养国际性法律人才 / 玛莎·米诺 著 孙海波等 译

李锦 校 204

美国文理学院常青之道对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启示 / 刘宁 213

探析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新发展 / 康晨宇 225

教师教育

教师继续学习的四大动力因素研究 / 刘琳娜 张彦通 236

课程与教学

早稻田大学商法教学模式改革及其启示 / 陈景善 芦超 246

以模拟谈判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 张淑静 257

通识课《现代汉语》教学改革探索 / 张彦 266

高教与社会

大学引领与支撑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启示 / 赵哲 宋丹

张建生 278

以职业生涯规划为导向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 刘凯 290

域外短札

图书馆及书店 / 陈力卫 302

他者眼光 / 左瑞杰 306

文化熔炉 / 王峥辉 309

高教政策与管理



Gao Jiao Zheng Ce Yu Guan Li

全球化大学中的管理主义、 劳动与新兴运动

迈克尔·W. 阿普尔 著^{〔1〕}

李慧敏 译^{〔2〕}

一、管理主义、审计文化和新自由主义主张

我想把这篇文章作为对政治性反思全球化大学治理和劳动过程中正在发生着什么语境的研究。在此过程中，除了要对影响高校的新自由主义冲动进行批判性反思外，我还想做其他两件事情。首先，如果我们的分析果真考虑到了变革的广度和深度的话，那么我想把需要分析的工作和工人的范围进行扩大；其次，通过对包括但不限于经常性的以课堂为基础的模式运动的扩大化讨论，我也想将对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着什么的一般批判性分析变得复杂些。因此，在本文后面部分，我迫切呼吁人们要密切关注保守的宗教运动和机构，它们正在对一些国家大学里知识的政治性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历史上的大学从来没有一贯地扮演社会“思想市场”的角色。实际上，高等教育的历史也是多种不同的团体为了入学机会、文化认同和权威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Bourdieu, 1984b; Nelson, 2001）。因为谁被允许或被拒绝进入大学、学习什么样的知识以及如何学习，都是“选择性传统”的一部分（Williams, 1961），高等教育领域已

〔1〕 迈克尔·W. 阿普尔（Michael W. Apple）：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课程与教学系、教育政策系教授，约翰·巴斯科姆荣誉教授，美国批判主义教育学代表人物，国际著名教育学家。

〔2〕 李慧敏：女，汉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与评估中心、高教所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课程与教学系访问学者。

经成为一个反霸权运动追求政治认同的场所 (Fraser, 1997), 也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运动追求文化复兴的政治场所 (Buras, 2008)。因此, 我们绝不应该浪漫地认为这是一个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把“追求真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

然而, 即便如此, 认识到高等教育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转变表现为: 大学的作用是什么? 大学在为谁服务? 大学怎么组织它理想的教师和学生? 大学对工作意味着什么? 当然很多这样的转变都是新自由主义冲动和经济危机的结果。

也许一些历史性的数据是很有益的。我自己的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在 20 世纪的 60 ~ 70 年代之间, 几乎 70% 的大学资金来自公共财政。自那以后, 公共财政支持急剧减少, 以至于到现在, 州只担负大学财政的 17%。真正的公立大学担负着强烈的民主化功能, 这种思想现在正在面临着挑战。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领导下的思想的一部分, 这种思想极端地将教育成本从公共的、政府的责任转嫁到“消费者”或“客户”的身上。这里面甚至包括了一个更大的常识上的转变。在转变了的常识中, 公立的就是“坏的”, 私立的就“好的”。这就要求民主的含义有重大变化, 因而, 民主不再是减少参与, 而是更多地与在一个竞争性的和私有化的市场上“做选择”相联系 (Apple, 2006)。

虽然这一历史责任的转变在美国表现得很强烈, 但是它不仅仅表现在美国。因而, 有意思的是,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正在度过我的强制性的无薪休假期, 而这个无薪休假的实施对象是所有国家工作人员, 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大学教师们。这就是政府预算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大幅削减的结果。然而, 在另外一个奇怪的、别扭的地方, 仅仅还有几个月, 我就要到英国一个著名的大学里履行我的教授责任, 在那里我也有一个教授职位。每一次我到英国, 都能感觉到, 所有在这些机构教学的人都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 大学已经不能与管理及理性的逻辑及程序分开了, 而这些管理及理性的逻辑与程序也正在改变着社会的每个角落。正如 Rosemary Deem 和其他学者早就深刻地指出的, 它们正在成为这些逻辑和程序中心的关键位置 (Deem, Hilliard, and Reed, 2008, Head, 2011)。实际上, 在英国某个我会周期性访问的大学的教育学院中, 我被告知如果我有任何问题, 我可以与我的“直线经理”联系 (语言确实能产生歧义。使用“直线经理”这样的语言, 这样一个采自

于工厂和私有企业的概念，会产生出对何为职业人和学术人的含义的极为不同的理解)。而且在那个同样的教育学院中，已经有人提出人员冗余了，教师们面临着调岗的现象。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其他很多高教机构里。

这样情景的发生应该是毫不惊奇的，虽然每一个人都确实、或者在哲学、历史、批判性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很好的学术声誉，但是在上文提到的人员冗余的英国大学的系所面临的极为严重的威胁，就是他们没有能力从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机构中得到财政资助。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很多国家的大学也在依据资金行事。所以如此，是有一个未被检验过的假设做支撑，即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只应该被当作一件商品对待，这件商品可以被组织和控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部分（Brown and Lauder, 2010; Slaughter and Rhoads, 2004; Apple, 2012; and Livingstone and Guile, 2012）。当然，知识可以是一件商品，但是把学术机构仅仅看作是“生产商”，经济地生产有用的知识，就把大学作为发展关键性智力的作用置于难以维持的境况中（Apple, 2004; Apple, 2012）。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有的历史、文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与传统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小。社会和社会生活以及其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因而也就被削减为仅仅是经济的了。这是一种短视和眼界狭窄的看法。

新自由主义没有单独行动。在近年来我出的几本书里，我已经详细地解释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力量组合，就是被我称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力量，我解释过这种力量是怎样改变了美国和全世界的教育和其他所有社会事物的。一种新的“霸权主义阵营”已经在过去30年里建立起来了。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的职业的一管理主义的中产阶级的管理者们之间紧张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联盟，这个联盟已经越来越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正如我们将会在本文后面部分所看到的某些国家里的威权民粹宗教保守主义那样）。在此过程中，这种联盟对什么是重要的知识、“合适的”的教学、好的学习、实际上对教育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怎么评价它的效果等都影响深刻。这些全球风行的事物是真的令人非常震惊的。

然而，虽然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逻辑确实具有影响结构的力量，可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能被简单削减为仅仅是我们机构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生产和再生产。体现这些力量影响的是这样一个标识，即这样一个事实：教职员工们和课程内容的边界正在被“审计文化”所改变。高教领域中广泛存在

的是：要求连续地“生产证据”，即正确行动——实质上是以一个企业家的方式而行动。例如，在很多国家，大学和供职于其中的教职员工的比较价值被发表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刊物上的文章数量所衡量。在某些国家里，这一趋势已经变得很严重。因而，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大学教职员工有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要用列举的方法说明他们的工作具有“价值增值”的功能，而且用法律来确认这种评价方式的有效性也正在一些州进行。

二、管理主义及其历史

正如我在《教育的正确之路》（Apple, 2006）中所显示的那样，为了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这些趋势需要与新兴的关于管理主义的文献相关联，这些文献描述了管理主义的新职业性的和管理主义的中产阶级的组合所具有的相当的影响（Clarke and Newman, 1997; Leys, 2003; Apple, 2005）。

这些管理主义运动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早期西部的工厂和办公室里的泰勒主义的引进。工厂和办公室里所实施的时间和动作研究以及将复杂技术削减为简单动作等的历史再次表明：不管是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制的结构性力量中，还是在中产阶级内部不同层级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中，体制变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Bernstein, 1977; Wright, 1985; Wright, 1989）。

例如，正如戴维·诺布尔（David Noble）在他优美而详细地描述泰勒主义以及与此相连的劳动控制技术历史时所指出的那样，泰勒主义发源于新近出现的专业化运动的努力，在这样的运动中，在专业化的努力下，机械的地位得以提升，并提供了工程师以新的身份。当机械从一种与商店地板上进行的手工工作所联系的东西分离开来，转移到一个更多地以大学为基础的学科的时候，为地位和尊敬而奋斗就变得极为关键了。新的被专业化了的工程师们不得不努力工作以向企业和工厂证明，他们有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对竞争、劳动控制和提高生产力来说，极为关键（Noble, 1979; Noble, 1984）。只有新型的管理知识赢得尊敬，这些知识才会被作为职业化事业必要的转换战略中所必需的文化资本（Bourdieu, 1984a）。泰勒主义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思想。

考虑到这个历史，现在很多国家正在经历的高等教育领域内在治理、工作条件和管理上的这种转变，就最好被认为是另一种最近兴起的“管理类课

程模块”的代表，这样的模块致力于培养高教领域内的权威。其中，专业知识需求再一次被制作成“不可缺少的工具”。现在的关键不在于工厂或者商业领域，而在于大学本身，大学反映了其他领域所发生的事情。在此过程中，一个新兴的阶层，一个拥有特定审计技能和使用归纳性证据能力的阶层，在国家和大学里创造出了一个就业领域，创造出了自己的影响力（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Slaughter and Rhoads, 2004；Apple, 2012）。正如桑德勒（Sandler）和我所说，这样的过程根植于两种运动：一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二是认识论上的运动。这些运动正在改变着什么是“有效的”基础（Sandler and Apple, 2010）。

当然，并不存在简单的程序性变革。请让我们记住，在所有教育建议背后都是一个公正社会、一个“好”教师、一个“好”学生的期望。我已经指出的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的“改革”，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构建了这些认同。而这些方式在我们的常识中预示了深刻的改变，这些方式挑战了对于公民和民主的基本理解。虽然对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阶级解放的中心原则，尤其是阶级在经济上的解放原则，但是阶级解放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还是有关键性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理解教育正在经历的转变及教育政治是极其必要的。马克·奥尔森（Mark Olssen）清晰地详述了这些差别，我认为很有必要在这里完整地引用。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代表着国家权力的一种负面概念，因为处于其中的个人被看作是一个要从国家干预中解放的客体，但是新自由主义也已经逐渐地代表了一种国家通过提供维持运转的条件、法律和机构而建立合适的市场角色这样的积极概念。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个体被标记为拥有一种自治的人类本性，能践行自由。在新自由主义那里，国家追求创造一种个体，这些个体是一种企业和具有竞争性的企业家。在古典理论模型中，从理论上，国家的目的就是，以包括普遍的利己主义、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旨在表明个人的利益也是社会整体的利益）、放任的政治原则在内的假设为基础，来限制和最小化国家的角色。在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个新因素，因为这个转变涉及了一个从主体位置，即“经济人”位置——这种人的行为很自然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与国家分离，转变到“可控人”的位置——这种人被国家创

造出来，不断地被鼓励“永远响应”。这标志着，并不是自利主体的概念被“新自由主义”的新理想所替换或摒弃，而是一个全民福利时代所蕴含的懒惰的可能性创造出了新形式的警惕、监视“绩效考核”和普遍的控制。在这样的模型中，国家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推到市场上。国家要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成为我们自己的事业”……这看起来是一个“没有管理的管理”（Olssen, 1996, p. 340）。

奥尔森的理论解释用生动的方式勾勒出了现实。我能想出一些更好的描述，来描绘西方很多国家中如此多的高校教师所面临的情景。这种情景多数被机构、课堂和讨论、研究及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上的个体或集体所考察（Apple, Au, and Gandin, 2009; Apple, Ball, and Gandin, 2010）。但是无论怎样，否认现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力是不明智的。

当然，有时候，复杂的、理论的、历史的、经验的资源要用来为这些全球性的现实佐证（Rhoads and Torres, 2006; Slaughter and Rhoads, 2004）。这一情况不仅仅适合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奥尔森关于社会变革的深刻思想，也同样适合于皮埃尔·布迪厄的有洞察力的看法。他认为，法国的学术机构和知识阶层与人们持续地被阶级关系所改变和复制着（Bourdieu, 1984）。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现实更容易被理解，这对我后面的讨论很重要。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文章后面的部分，我要详述正在发生的变化，开阔我们的视野，以便使我们的讨论能包含一些群体，这些群体通常不在我们批判性讨论的范围中。

三、谁的劳动？

例如，很多高等教育领域中新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的批判性文献已经很详细地叙述了高教领域中，尤其是人文类高等教育领域中全职和非全职的教师们所正在经历的变化（Schrecker, 2011; Aronowitz, 2006），并且已经指出，这些变化对于学生和课程来讲意味着什么。但是，有点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相关文献都没有包括同类领域中别的职员，如办公室工作人员、建筑维护工、食堂员工、保安人员和其他一些人正在经历着的更加糟糕的情境。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强度增加、职位丢失、薪水减少，还有很多其他真实、可悲的事情。

让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在我自己工作的大学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校园里每个教室和办公楼都不得不在每天下午4点半关闭。财政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学预算削减意味着更少的工作人员，现在，他们每天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教学结束后去检查所有的建筑的门是否上了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办公室的垃圾一周只收一次了。

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它们涉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只有更少的人去做一些重要的但是“隐蔽的工作”了，而这些工作对于维持大学运转来说很重要。在许多大学，他们的工作已经被外包给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的员工工资少、效益低，他们的“生产力”被不断监测，他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去补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这种工作被那些低薪水的工人、移民和流浪者完成的事实就表明了一种甚至在进步的学术机构中也存在的令人悲哀的趋势——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在持续性地欠债给这些人，没有认识到“帝国”、流浪人口与使这些学术人能够完成教学工作的隐蔽劳动之间的关系（Apple, 2010）。因而，虽然很多国家的很多批判性文献非常具有说服力，对于呼吁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团结也很有作用，但是这些文献同样也忽略了一个机会，即提醒我们认识到在同类机构里面那些做着其他工作的人们。审计和“绩效能力”正在被更多的人感受到，其中很多人在我们对高级领域内正在经历着的历史性转变的批判性分析中是缺席的。

对大学里更广泛的工作以及是谁在做这些工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在这里简单叙述。我们需要警惕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我们完全能从课堂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运动和变化。也许，管理主义的一部分历史是一个更长的战略性行政控制劳动历史的一部分，存在于绩效、审计和取证的程序性技术中。但是管理主义也根植于一系列的性别逻辑中。

正如凯思琳·林奇和她的同事们已经在一系列非常详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产生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技术，不关心“情感平等”，不关注“关怀、爱和团结”的价值观，而这些却是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和责任（Lynch, Baker, and Lyons, 2009; Lynch, Grummell, and Devine, 2012）。实际上，如我在《教育能改变社会吗？》这本书中所提出的那样，如果不把关心、爱和团结作为“结构性因素”，作为所有根本性改变的构成因素，那么教育机构本身以及教育机构内部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性改变都是不可能的（Apple, 2013）。

四、威权民粹主义和高等教育的新现实

目前为止，我已经详细讨论了影响高等教育的一些显著转变，以及一些不仅仅在美国也在其他国家里日益凸显的转变。我将这些转变与管理阶层的战略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联系。考虑到高教领域内正在经历的严重经济危机，我们可以预见，这些影响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加深和变坏（Rhoads and Torres, 2006）。但是仅仅关注这些意识形态和经济活动是不够的，因为那里还存在很多实质性的对高等教育本身，包括对其内容和实践在内的挑战，而这些存在于我们通常的关注面之下。这就涉及了一个保守主义现代化的因素，此前我曾经提到过，即威权民粹宗教保守主义。虽然这个运动也许没有在所有国家中出现，但是，在我们所称的“发展中国家”中和宗教紧张很严重的国家里，这个运动已经日益明显，而且这个运动也存在于美国高教领域改革的“中心”。

让我再举个例子。另外一个日益明显的、将要深刻影响高等教育的运动是“家庭教育”（home schooling）。这是在国际范围内发展最快的一种运动，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宗教运动和情感的复活。这一点在美国尤其强烈。在美国大概有二百万到三百万儿童不能到公立、私立甚至教会学校中去，而是在家里被他们的父母教育。这一运动在其他国家也正在出现。虽然家庭教育运动是复杂的，但是一大部分父母却因为保守的思想和宗教的原因而正在这样做着。我提到这一运动，是因为这些保守的父母，尤其是那些非常保守的信教父母们，正在要求他们的孩子们的科学课程方面被给予上大学所需要的学分，而他们的科学课程否认生物进化和宇宙大爆炸理论。这一运动要求给予或者在家里或者在严重保守宗教学校里所学课程的学分，而这样的学校以“读圣经的方式”来教授科学（Apple, 2006）。现在美国已经出现的法庭案件显示，案件当事人正在努力通过一种法律体系，来挑战这些大学所具有的否认以这种极端保守的家教教育者和基督教学者所教的“科学”的学分的权力。对于这些保守主义的父母来说，教育“民主”就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有权力可以教给他们的孩子以任何他们的信仰和认识所需要的东西（Apple, 2006）。因而大学必须在这种特定的对民主的理解上转变观念，通过将这些内容和课程看作科学课程中“合法的”内容而行动。

我们需要近距离地考察这些趋势，尤其是当美国德克萨斯州已经正式规定，达拉斯的创世研究所——一个保守的宗教研究机构，致力于抵制科学中的进化现象——在提供有学分的科学课程教学的时候。因而，不仅是人文类课程，而且连科学类课程本身也正在接受保守的宗教运动的抨击。美国公立学校（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教师，现在能够一边教授科学课程，一边否定很多基本的进化事实和现象——包括气候变化等这样的课程内容，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中越来越多的学生们带着与此相同的看法走到这些教师身边，这将会给什么是合法性知识和合法性知识的拥有者带来深刻的影响（Apple, 2000; Apple, 2006）。

这些事情涉及日益强大的保守主义宗教运动，他们将对高等教育带来的可能的、持久的影响，我这里所提出的，已经超出了一些新近的文献所清楚表达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于高校教师和课程内容的攻击（Schrecker, 2010）的程度。除了这种大规模的以营利为目的的远程教育机构如凤凰城大学和它的模仿者之外，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里，发展最快的部门是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机构。这些机构雇用了上千名的教师，与大的保守主义性质的公司，如沃尔玛等，有着极为密切的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Moreton, 2009; Apple, 2013）。

因而，虽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积极表达对人文科学和新自由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主张进行攻击的担忧，但是要深入思考他们却需要我们面对一个更大的机构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趋势阵营，这个阵营要比我们支持的阵营大得多。不认真对待这些运动，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忽视基本的被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认同的变化。这些宗教运动及其认同是怎么被拉入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重构中的，这不重要（Kintz, 1997），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概念的挑战具有持久的影响。

因而，无论如何重要，我也会敦促我们的批判性关注点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在这里新自由主义用复数来表示是非常重要的）性质的大学目的和手段的根本性重构，超越管理主义作为一个阶级的具体战略的影响。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日益发挥作用的保守民粹主义宗教认同、其认识论和机构。当“改革”激发起一种关注审计、知识的经济作用、企业主义、消费者选择的“伦理”时，这个关注将把学生和父母当作“顾客”，自下而上地满足民粹主义宗教政治冲动及认同，用他们自己的话语重新表达这些话语和体制要求（Apple,